

格就是调查样区。每个样区内又会设置 10 个至 15 个调查样点，调查人员需要记录在样点看到、听到的所有野生鸟类。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鸟类并不是只依赖眼睛看、靠相机拍，还要靠耳朵听。这与平时观鸟“加新”（指观察到新的鸟儿）的体验不同，要求调查员得熟悉当地常见鸟的鸣叫声。因此，在正式“上岗”前，调查员们还需要接受多次培训和考核。

“这项调查在 2025 年开启，但早在 2021 年我们已经开始酝酿。在国外和中国香港，类似的网格化调查相对经验成熟，我们有学生去进行了相关的调研；近年来，阙品甲老师的团队在成都也开展了一些以标准化的方法‘数鸟’的调查活动——成都繁殖鸟类调查。”刘阳说道。

谈及 CBBS 为何在今年正式开启，刘阳表示，CBBS 并非一项“纯科研项目”，而可以被视为一种由公民参与的“鸟口普查”，因此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

据中国观鸟记录中心负责机构朱雀会对中国大陆观鸟人群的调查显示，2017 年观鸟活动影响人数超过 14 万人次。这一数字在近年持续高速发展，到 2023 年总数量已经实现了成倍增长。

《中国鸟类观察手册》从 2021 年出版至今，已经销售了十多万册。作为可能是中国第一

代观鸟爱好者，刘阳意识到这个数据反映出中国的观鸟爱好者已是相当庞大的群体。

观鸟爱好者们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志趣，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参与科研项目，帮助科学家收集数据。截至 4 月下旬，五个城市报名 CBBS 的调查员已经超过了 500 人。

与之对应的是，考虑到公民参与的可行性，CBBS 将城市作为主要的调查地。据刘阳解释，城市人口更多，观鸟爱好者更集中；公民科学家们时间有限，关注城市中的鸟类更方便；城市环境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

作为 CBBS 广东团队核心成员，在深圳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工作的戎灿中告诉本刊，如今中国的大城市中已有许多观鸟团体。此次调查的前期筹备，他负责的一项工作就是尽可能将这些团体连接起来，让更多人参与。

过去在一些报道和宣传中，常常能见到“某地出现一种鸟，意味着当地环境明显改善”的说法。但是在刘阳看来，这样的说法并不严谨，“我们不能以单一物种短暂的出现或消失来评判某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变化，因为这当中会有偶然性”。

因此按照计划，CBBS 的调查将持续 3 年。发起者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调查。调查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开展，时值许

多鸟类的繁殖期。大部分鸟类在繁殖期都会占区营巢，活动范围比非繁殖期更固定。在此时展开调查，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

成为一名观鸟者

20 世纪 90 年代，刘阳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已经爱上了观鸟。他记得当年在城市中的观鸟爱好者，多是一些鸟类学工作者。

“学术化”，也许是中国早期观鸟爱好者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在刘阳的观察里，那会儿大家“一板一眼”，观鸟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在中国，观鸟在近些年才成为热潮。但回顾观鸟这件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已有两百多年。《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认为英国观鸟活动的鼻祖是 18 世纪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怀特在工作和生活的教区长期以“古法”（裸眼）观鸟，细致记录物种的习性、迁徙行为。“birding/birdwatching”这个专有指称在 19、20 世纪之交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大众观鸟潮流兴起的标志。

20 世纪初期，在华的欧美人士把观鸟活动带入中国。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英国人威尔金森（E. S. Wilkinson）和成都的戴珍等人开启了国内观鸟先河。

除了观鸟爱好者数量迅速增